

论黎紫书《余生》中的动物意象与女性创伤

On Animal Imagery and Female Trauma in Li Zishu's *The Remaining Life*

侯霞 (Hou Xia)

内容摘要: 黎紫书《余生》以微型叙事切入现代性语境, 透过动物书写与女性主体性的互文关联, 探询家庭、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伦理身份生成与选择。作品将动物意象作为创伤隐喻的载体, 在伦理身份失范与解体的情境中持续积累并放大创伤的叙事张力, 从而递进式呈现当代伦理困局。其跨物种的伦理联结既拓展了马华离散创伤书写的表达疆域, 也在审美层面彰显并捍卫生命尊严。

关键词: 黎紫书; 《余生》; 伦理身份; 动物意象; 女性创伤

作者简介: 侯霞, 周口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华文学、创伤叙事。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来西亚华裔创伤文学叙事与中华文化关系研究(1945-2015)”【项目批号: 24BWW024】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Animal Imagery and Female Trauma in Li Zishu's *The Remaining Life*

Abstract: Li Zishu's *The Remaining Life* enters the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through micro-narratives. By weaving animal writing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into an intertextual dialogue, it interrogates how ethical identities are formed and chosen within familial, social, and cultural spheres. The work utilizes animal imagery as a vehicle for trauma metaphors, and in situations where ethical identities lapse and disintegrate, these images steadily accumulate and magnify the narrative tension of trauma, thereby progressively unfolding contemporary ethical dilemmas. Its cross-species ethical bond not only widens the expressive territory of Malaysian-Chinese diasporic trauma writing, but also, on the aesthetic plane, proclaims and defends the dignity of life.

Keywords: Li Zishu; *The Remaining Life*; ethical identity; animal imagery; female trauma

Author: Hou X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466001,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rauma narratives (Email: 20071005@zkn.edu.cn).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本名林宝玲）屡获“花踪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其微型小说集《余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该作品以冷静节制的笔触勾勒现代社会众生相，在凝练的叙事中透射出对生命本质的省思与人性的深刻洞察。黎紫书对微型小说这一体裁有着自觉的美学追求，她在《余生》后记中强调，这种文体“它讲究凝练，到极致时，是小说与诗融入彼此后烧出来的结晶”（黎紫书 263）。这一创作理念深植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从中学毕业后的多种职业体验，到在《星洲日报》担任高级记者的十三年生涯，再到跨国旅居的生活经验，这些丰富的社会接触为她提供了观察现代人生的多维视角。

《余生》收录的71篇作品中，过半数以受创女性为叙事核心。黎紫书在这些故事中创造性地将动物意象与女性形象并置，形成多层次的意义空间：一方面，动物作为“他者”隐喻，揭示出女性在人类中心主义秩序中的边缘处境；另一方面，通过展现女性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联结，构建出跨物种的生命共同体想象。这种书写策略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笛卡尔将动物理解为“没有感觉、没有激情、没有生命的机器”（施璇 33），这种工具化认知与现代性权力结构中的殖民逻辑和性别压迫形成同构。在种族、性别与物种的三重压迫格局下，黎紫书通过动物意象既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暴力，也为边缘群体开辟了隐喻性的表达路径。伦理身份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余生》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社会中伦理身份的困境。通过女性与动物处境的相互映照，黎紫书展现了家庭伦理身份的缺失、社会伦理身份的错位与文化伦理身份的消亡这一三重危机。在开放式结尾的表象下，隐含的是对消费主义时代人的存在困境的深切忧思，引导读者思考在现代化语境中如何重构伦理身份与进行伦理选择。

一、家庭伦理身份的缺失

《余生》借由对跨物种共通情感的呈现，揭示了在人类亲属家庭伦理身份缺失的语境中由此引发的关系断裂。作为叙事母题的小说“留守”，在正叙线索的三处关键伦理节点上不断被凸显，勾勒出主人公老妇人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恪守：她坚守妻子、母亲与外婆的角色认同，对丈夫、女儿与外孙女不计回报地付出。

老伴瘫痪卧床三年有余之际，老妇人尽心尽责承担照护。然而，这一高强度、耗竭性的照护劳动非但未能唤起女儿的理解与共情，反而被转化为其进一步索取的依据。按常伦，母亲理应获得子女的敬重与赡养；但在此语境中，老妇人的主体性日渐被物化，其生命经验与价值被狭隘地压缩为满足家庭成员需求的纯粹工具性资源。这种伦理冷漠的根源在于，女儿与女婿受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氛围的驱动，激活其“斯芬克斯因子”中

的“兽性因子”，从而在伦理冲突中选择性忽视老妇人的体力劳动、情感付出与内在感受。“‘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选择或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德”或“恶行”的选择或冲突”（吴笛 31）。由是，他们抛却了家庭中作为女儿与女婿的伦理身份，一切以利己与实用为行事原则；不顾母亲方才送走亡夫之痛，旋即令其承担起照料一只被他们弃养的小狗的任务。在此，老妇人照顾小狗是第一个重要的伦理结。小狗原为女婿饲养，因陪伴的新鲜感与意义消退而被随意转托给老妇人。女儿明知老妇人“鼻子太敏感，忍受不了狗身上的气味”（黎紫书 33），仍以“陪伴母亲”为名强加其上，实则是对她所剩无几的照料资源的又一次榨取。

在孩子出生后，女儿与女婿再次放弃作为父母的伦理身份，如同先前弃养小狗一般，立刻将刚满月的婴儿推给母亲照看，并借口说“是你的亲外孙女呢，让她陪陪你”（黎紫书 33）。老妇人被迫再度承担育婴之责，形成第二个伦理结。当她试图表达疲惫与压力时，女儿与女婿却回应：“连自己的妈都这样，那我们随便找个保姆算了”（黎紫书 33），其交易化的思维方式暴露无遗。母亲被直接与“保姆”的角色对标，使其作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与主体尊严在这种比较中被彻底抹除。直至孩子四岁，女儿仍未确立自身的母职伦理身份；她不仅阻止孩子接近狗，也进一步限制其与外婆的亲密互动，训斥道：“别过去啊，狗狗脏，狗狗臭臭”（黎紫书 35）。在此，动物意象成为母亲的隐喻：一旦失去“使用价值”，便被弃置。老妇人的孤独留守与被抛弃的狗互为映照，构成物质与消费高速发展的城市社会中老一辈的遭遇缩影。

在商品经济高速扩张而精神伦理建设滞后的背景下，年轻一代逐渐脱离以亲缘为纽带的农业社会伦理，转向实用主义导向的伦理选择。老妇人的生活处境并非主动求变，而是被动承受不合理安排；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她缺乏拒绝的能动性，其深层根源在于传统中国母亲的伦理身份将“为家付出一切”视为核心规范。她几乎对家人的一切需求有求必应，将“为家而活、为家而劳苦”内化为自我价值的唯一依据，为不拖累女儿而接受孤独与留守。随着身心耗竭、其“可用性”递减，女儿与女婿的关系亦日益疏离，“下次回来不知会是什么时候”（黎紫书 35）。在功利逻辑之下，她被视为暂时无“使用价值”的存在，终至孤身留守家中，与题名“留守”相呼应，并构成最终的伦理结。

文本中那条被弃养的狗的命运，构成对老妇人处境的冷峻镜像。女儿曾许诺毕业两年后便将狗接回，然而十四年光阴流逝，承诺始终未获兑现。狗与老妇人同被置于“服务性功能”（陪伴/照料）的框架之中；当其功能被榨取殆尽，即遭遗忘或抛弃。她们均未被家人视为具备内在情感世界与自主需求的生命主体，而是可被随时调度、使用乃至废弃的资源。在这一叙事中，老年女性与犬类之间的情感共生，实则是对家庭伦理身份缺失的补偿，因

而成为对当下社会家庭结构的批判性隐喻。当四岁的外孙女被女儿强行带离时，“家里的狗像是有所觉，这一上午都病恹恹地趴在角落里，就连她带它出门散步，它也不太提的起劲”（黎紫书 32）。微型小说因篇幅所限未书写老妇人的心理活动，但我们可由狗的情绪反应逆向推断她的内在状态。老人表面自称“解脱”，可以重回太极场，内里却与犬只同沉于与孩子即将分离之痛——“还想回去再与她多缱绻，闻一闻她身上越来越淡了的孩儿香”（黎紫书 32）。日常相处中，狗以“尾巴甩得像风车轮子”（黎紫书 32）的欢悦，弥补家庭的情感缺位；而在别离时刻，它以耷拉耳朵的姿态具象化老人被压抑的哀伤。

“笛卡尔认为动物没有语言、情感和意志，动物不能感知疼痛，更没有理性，不能进行思考和判断”（田玉霞 30）。这一动物机器学说与将女性物化的逻辑在本质上同构：均将有感知的生命体降格为无情感的机器。当女儿一方面将狗界定为陪伴母亲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把母亲等同为可替代的保姆，她事实上实施了双重异化——既否认动物的生命性，也抹杀母亲的主体性。女儿将狗与婴儿相继强加于母亲，已背离血缘伦理的责任认知；她对母亲的剩余价值进行持续性榨取，扭曲了代际伦理应有的互助与关怀，使家庭关系异化为一种隐匿的剥削机制。其背后是理性意志在功利主义驱策下的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中心的任性自由意志。按理，人性因子的理性意志应以伦理意识约束对他者（包括非人类生命）的剥削冲动；一旦自我中心主义压倒道德判断，兽性因子中的自私本能遂占上风，最终瓦解了家庭成员应承担的基本伦理身份与责任。

二、社会伦理身份的错位

在《余生》中，家庭伦理身份的缺失使得女性在家庭中难以正确认识自身的责任，进而影响她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定位。这种现象导致一些女性在步入社会后，面临身份的迷失与困惑。在小说“她·狗”中，年轻女性未能选择符合社会伦理的身份，反而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缘，成为情人，导致其在生存困境中做出非理性的伦理选择。“道德个体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除了做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之外，还有可能因价值迷失、身份焦虑或主体性缺失而精神迷茫”（苏晖 304）。女孩在大城市的街头流浪，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她没有依靠自己双手工作挣钱，而是逐渐迷失正常的伦理身份（朋友、邻居、同事、路人等），选择法律所禁止的长期同居下的重婚者身份和道德所不允许的情人身份，依靠已婚男人的收留和施舍度日。在这种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下，她任凭男人呵斥和嫌弃。男人“每周两个傍晚会在妻子上班后开车过来”（黎紫书 198）的到访周期，将女性视为纯粹的生理服务功能，其情感需求与主体意志在违背社会伦理的畸形关系中彻底缺位。男性经常对同居空间中的狗子的吼叫“滚开，杂毛！”（黎紫书 198）他作为权力主体对

非人类生命与女性情人进行双重物化。男人处于关系的强势，任意发出指令否定女人的情感或陪伴的需求，甚至是命令女人放弃养狗与打掉胎儿。当男性提议弃养时，女人“没有抗议。抗议也没用吧”（黎紫书 200）。她深知自身与宠物一起寄人篱下，没任何的自主性。此前男人的“为别的事情争执时，男人利落得很，无言语时甩门便走”（黎紫书 200）。这种惩罚机制，使得女人的反抗能力与主体性完全消解，后续继续发展为女孩的精神迷茫中的惆怅和委屈。女性创伤的根源在于当现代社会的伦理环境（如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本身就己“兽性化”时，个体（尤其是弱势女性）的“人性因子”被社会中某些男性为主导的兽性因子压制、扭曲甚至瓦解，最终造成社会伦理身份的错位。

成为合法妻子或者是隐匿的地下情人的社会伦理身份的错位致使女人产生了伦理身份焦虑。另外，女人在情人或母亲的伦理身份之间的“选择”困境中极其痛苦。她纠结留住孩子，成为母亲，还是打掉腹中的胎儿，继续做一个听话的情人。最终那个没成型的孩子连名字也不配拥有，“也只是颗没名没分的泡沫”（黎紫书 201），她没有能力抚养婴儿，也不能获得男人的许可，更没有资格拥有母亲的伦理身份。她把自己的身份焦虑投射到小狗的身上，作为狗主人是她唯一能找寻的伦理身份，给它取个好听的名字，就意味着女孩拥有了仅存的主体性。因此，“给狗儿取名于她竟成了件庄重的事，仿佛那是个仪式，接纳它，向它宣告，这儿是你的家”（黎紫书 201）。然而，还未等到女孩命名的那一天，小狗意外偶遇原主人，“柳足劲，一下子如箭离弦，挣脱了她”（黎紫书 201）。文本中的“狗儿”并非简单的叙事陪衬，而是具隐喻功能的意象。它与女孩的漂泊状态及被男性嫌弃的境遇形成意义上的耦合；其最终归返原主人，象征女孩的情感与生存始终缺乏稳定依托，并暗示男性最终可能抽离关系、离她而去。小说由此呈现一种游离于法律保护与道德约束之外的伦理身份，并在叙事层面揭示其悲剧性逻辑：越界的身份选择往往导向孤绝与败局。

“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类理性文明的吹嘘，使人类妄想凌驾于万物之上，这最终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思想”（王蕾 83）。然而，“动物伦理主义者认为，动物不是被人类随意榨取的资源，而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生命体”（杨宗良 158）。从伦理选择的角度审视，女性与动物之间建立的共生关系，实则构成一种对自我伦理身份的重构与捍卫。在“她·狗”中，女性与流浪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收养，呈现出两个被城市边缘化的生命体之间的深刻联结。初到都市的女孩“挽着两个鼓鼓的行李四处避雨，还被人驱赶”的窘迫处境，与流浪犬“在雨中眨动着忧伤的眼睛凝视着她”的孤独形象形成镜像般的呼应（黎紫书 200）。每当男人在夜色中离去，女孩与狗共同承受被关门声放大的寂寞，彼此以沉默相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学机器的运作逐渐停摆，人与动物彼此联接、相互贯通，共同构建出一个多维

度的亲缘世界，展现出诗学艺术在探讨动物问题上的丰富张力”（郑春晓 102）。这一动物意象构成了对现代都市生存状态的深刻寓言。女孩与狗共同经历的寄人篱下之境，隐喻着新自由主义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系统性排斥。当人类文明将情感联结异化为可计算的资源时，跨物种的情感纽带虽能暂时缓解存在的孤独，却难以成为挽救伦理身份的根本途径。

三、文化伦理身份的消亡

家庭与社会的伦理身份一般情况下聚焦于一个群体、地域或者种族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氏族、部落和国家都是由人组成的，因此氏族、部落和国家也一样有了伦理属性”（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19）。在全球化语境下，个体的身份困惑汇聚为族群的文化身份危机。虽然承袭着自己的母语与传统习俗，却经常在移民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感受到被疏离。每个人的共同的身份困惑逐渐串联放大，变为本族层面的文化身份危机。《余生》涉及跨种族、跨地域与跨社会语境中的文化伦理身份议题。家庭伦理身份的缺位与社会伦理身份的错位相互叠加，共同加剧了文化伦理身份“消亡”的危机。在小说“迁徙”中，一名华人女孩与其外国男友谈起天花板上的壁虎。男孩解释，这种小型壁虎随东亚商船漂洋过海而至，“繁殖力很强，以前都没出现过的，突然间到处都可以看到”（黎紫书 84）。女孩怜惜壁虎可能会想家；男孩看出她由壁虎联想到自身，对嫁往异国他乡的顾虑，遂安慰说，以后若想念家乡，可以乘坐飞机，三十多个小时的旅程便能回家。女孩随即疑惑这些壁虎在当地是否有语言障碍；她想起两次听他与家人通电话时，一点都听不懂的语言所带来的隔阂。她对男孩说：“有点怕呢。太遥远，太陌生，太孤单。去到那里以后，似乎除了你，我便一无所有了”（黎紫书 85）。当她追问壁虎的后续境况时，男孩自豪地回答，它们慢慢越来越少，最后几乎消失了，只剩下本地体型更大的壁虎，“是原来在那里的壁虎把它们吃掉了”（黎紫书 86）。

“迁徙”一语双关，既指先前壁虎的跨海移居，也预示女孩未来的远嫁。他乡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冲突迫使她在伦理身份上作出艰难抉择：是放弃自身所依凭的语言、风俗与思想，还是转而接受他国文化？她的困惑正在移民国身份与中华文化身份之间摇摆。然而，多元文化语境下身份的流动性，并非可由类似壁虎“体型大小”这类外在、生理标识所界定，而在于“思想与精神层面对某种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包括语言）的选择与认同”（苏晖 296）。小型壁虎被大型壁虎吞食的叙述，遂成为女孩未来境况的隐喻：一旦将他国文化身份作为唯一归属，自我文化身份可能被完全替代。当女孩听闻“家乡来的”壁虎最终几近绝迹、只余本地大壁虎存活时，她仅答以一声“哦”，随即陷入沉默与思索。她的反应中透出忧伤与失落；与男孩的对话愈发低微，“那幸福感是浮动的，如此的不确定”（黎紫

书 85)，她近乎喃喃自语地向他发问，却不经意地用了华语。可见，文化伦理身份的选择本就是一场充满纠结与痛感的过程；置身他国或他族的环境，每一次取舍都可能成为创伤性的体验，弥漫着危机与不确定。

华裔女性作家通过这种细腻而反转的叙事，实现了文学伦理批评的实践意义。在父权制与跨国（跨族群）交往的伦理秩序中，异族女性与动物往往被边缘化、被同化、被去主体化。文本通过描摹女孩由对婚姻的憧憬转入疑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轨迹，控诉华族文化身份在权力博弈中的被压抑与被挪用，并由此唤醒读者的伦理感知：每一个被压迫的文化身份背后，都是应受尊重的文化主体性的无声呼告。正如黎紫书本人，其文化之根植于马来西亚霹靂州怡保；汉语与中华伦理观念构成其身份认同的底座。即便远嫁美国，她仍坚持语言与国籍不改，以华语创作、以伦理思辨为旨，维系自身的文化根系。由此，她笔下常回望先辈为谋生远渡南洋、母辈故土仍在中国的集体记忆；读者遂得以在其华语叙事中辨认“自家小城”的生活切片，进而生发共鸣与反思。

《余生》中有着丰富的跨物种的伦理联结，这为马华离散经验中的创伤表达开辟了新途径。首先，从动物作为创伤的“隐喻的工具”拓展为“生命的关联”。马来西亚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的动物具有隐喻创伤特征，而《余生》中的动物既隐喻主人公所经历的创伤，又把人与动物（如小说中的狗、壁虎、猫等）联系在一起，共同经历创伤。其次，动物与人的创伤空间从“历史政治场域”转移到“生命伦理场域”。传统马华离散创伤叙事常集中在马来西亚国内的民族认同、文化冲突和历史记忆的纠葛，而《余生》通过跨物种联结，小说将创伤置入一个普遍性，去在地化的现代全球社会中，没有地理特征，人物也无名无姓，文本使用“她”、“他”或“女人”、“男人”等称谓表达普遍涵义。离散者与动物一起经历飘零感与孤独感，从家庭、区域到超越国界。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解读《余生》中“跨物种伦理”的叙事实践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伦理身份”的困境与转变，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基于不同的伦理身份的定位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推动人物命运的变化与主题的深化。这些选择推动叙事情节发展，深刻映射人物的心理创伤，由此可以更深入剖析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与动物建立共存关系时所产生的内在道德张力与伦理身份重塑的迫切性。

结语

在马华文学场域，作家要获得可见度往往需借助奖项加持；而评奖与市场对“在地性”标识的偏好，也推动文本在地景、物候与民俗符码上着力。黄锦树、张贵兴等作家笔下频出的椰风蕉雨、野猪鳄鱼、橡胶榴莲、洪水沼泽等意象，连同“中华性”的诗词、礼俗与民间故事，以及东南亚社会华人的国家与族群身份的认同困惑，共同构成了被反复调用的审美范式。黎紫书的《国

北边陲》等作品凭借此路径获得花踪文学奖，但在后续出版的《余生》中，我们辨识出一条从“直面在地历史”到“去在地化”的创作脉络。这一脉络并不是断裂，而是马华离散书写的深化与升华。当历史创伤如此沉重又被马来西亚官方话语遮蔽，当“说故事”本身都成为难题时，书写者是否要寻找一种新的语言？《余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使她的作品从马华文学的具体坐标，驶入了关乎人类普遍境遇的广阔海域。她将镜头移至衣食住行的日常现场，以微型叙事捕捉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存轨迹与精神困境，将国族寓言转化为具有跨地域普遍性的伦理议题，以小见大，直面女性被物化、工具化的现实。

“作为伦理选择的方法，教诲需要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文学”（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 7），文学的教诲功能是通过展现这类扭曲的伦理选择及其后果之后来实现的。“如果文学理论不能发挥引导作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理论就会因为无用而死去”（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565）。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下观察这些叙事共同指向同一伦理危机，即对女性的工具化。黎紫书将马华离散经验中的创伤转化为美学形式。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写作方式和内容超越了简单的乡愁叙事，通过对特定伦理身份困惑的深刻呈现，为读者提供了普遍性的道德思考。《余生》的文学价值在于，它通过“微创伤”的诗学表达，展现伦理选择的复杂性与日常性，记录马华离散群体的伦理处境，为文学如何介入现实伦理问题提供了通过最细微的生活切片来实现的范式。

Works Cited

黎紫书：《余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

[Li Zishu. *The Remaining Life*.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5.]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5-25。

[Nie Zhenzha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Choi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5-25.]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名作欣赏》7（2020）：5-11。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Masterpieces Review* 7 (2020): 5-11.]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The Scientific Turn in Humanities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施璇：“笛卡尔的动物——机器说新论”，《复旦学报》2（2025）：33-42。

[Shi Xua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s Beast-Machine Doctrine." *Fudan Journal* 2 (2025): 33-42.]

苏晖：《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Su Hui. *Ethical Criticism of American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20.]

田玉霞：“后殖民动物批评视域下的《与狼共度》解读”，《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2020）：27-31。

[Tian Yuxia. "An Analysis of Farley Mowat's *Never Cry Wo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Zoocriticism." *Journal of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 (2020): 27-31.]

王蕾：“库切小说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解读：基于动物伦理观的探讨”，《西昌学院学报》2（2017）：82-85。

[Wang Lei. "The Analysis of Coetzee'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On the Ethical View of Animals."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 2 (2017): 82-85.]

吴笛：“斯芬克斯因子”溯源与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2022）：26-36。

[Wu Di. "The Origi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phinx Facto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2): 26-36.]

杨宗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动物转向”，《当代外国文学》1（2025）：156-163。

[Yang Zongliang. "The Animal Tur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2025): 156-163.]

郑春晓：“人类学机器的停摆与伴侣物种：露易丝·格吕克诗歌中的动物叙事初探”《当代外国文学》2（2024）：97-103。

[Zheng Chunxiao. "The Shutdow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Machine and Companion Species: Animal Narratives in Louise Glück's Poet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4): 97-103.]